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estern Marx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张秀琴◎著



人民出版社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estern Marx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张秀琴◎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董晋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张秀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1-017418-1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390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XIFANG MAKESIZHUYI FAZHANSHI

张秀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32 千字

ISBN 978-7-01-017418-1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之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5XNI008）（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

序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于 19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一般称之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身后，于全球范围内经历了诸多不同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阶段，其中最重要的节点分别是：（1）第二国际理论家阶段（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一般称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2）第三国际理论家阶段（20 世纪初至前苏联解体，以列宁等人为代表，一般统称为共产国际或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主要受后者影响的（3）中国马克思主义（20 世纪初至今）。这一脉络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正宗和经典。

然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地区）却出现了一种“新”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创始人之一、德国人柯尔施在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 1930 年再版而写作的一个《反批评》材料中，首次将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lichen Marxismus），以区别于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即“俄国马克思主义”（russischen Marxismus）^①。以后，这一指称遂被沿用：1955 年，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① “westlichen Marxismus”，参见该书德文 1966 年版第 72 页和第 58 页注释 17（*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von Erich Gerlach (Herausgeber),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p.72, p.58.），该书 1970 年英文版第 134、120 页将其英译为“Western Marxism”（*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Fred Halliday, New York and London: NLB, 1970, p.134, p.120.）；其 1989 年中文版中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德]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3 页）。

义者梅洛·庞蒂在其《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单列出了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标题的第二章题名^①，明确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匈牙利学者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对立；1976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②一书的出版，则使得多少带有点冷战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为中文语境所逐渐熟悉^③。

就像所有的思想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一定都是体现在观念中的时代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对“后十月革命”时期欧洲革命之路的一种反思的结果，也即对俄国十月革命遗产的一种反思和再审视。也正因为这样的反思一开始就立足于欧洲本土的“地方主义”特点，所以它对欧洲作为现代化发源地的诸多反思（主要表现为对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等），既与马克思在19世纪的旨趣特别是《资本论》中的重大议题不谋而合，并因此被纳入国际马克思主义大家族的谱系之中；也为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当代人（含中国人）对自己所生活的现代文化境遇有了更为警醒的认知与研判，这或可是本书写作的实践意义之所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学科建制化（2005年国家教育部将其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为题名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并成为近10年来中文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三大最富理论鲜活度和生命力的创新研究域（其他两个领域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文本文献研究），莫不与其所坚持的与时代同步的现实感紧密相关。

① 即该书第二章“le Marxisme 《occidental》”，参见该书法文版：Mauric Merleau-ponty,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Gallimard, 1955, p.48。

②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 Verso, 1976；中文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根据其1977年版译出，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随即出现的中文语境相关研究成果有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也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中文，参见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特别是21世纪以来，相关著述则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著述包括俞吾金等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本书拟从思想史的叙事视角，立足于相关重要文本文献之理论贡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20 世纪 20 年代至二战前的“形成期”、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发展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当代演变期”。试图对这三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著述及其基本观点（无论是文本文献、范畴还是问题主导）进行归纳，以期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线索。

目 录

序 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1
第一章 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	1
第一节 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2
第二节 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	7
第三节 葛兰西：“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18
第二章 源起：第二、三国际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27
第一节 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 总体原则	28
第二节 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辩证 唯物主义	37
第三章 西马学者对“巴黎手稿”的解读：20世纪30—70年代	48
第一节 20世纪30—40年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巴黎手稿”	51
一、马尔库塞与“巴黎手稿”：法兰克福学派解释的开端	51
二、卢卡奇、柯尔施与“巴黎手稿”：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 解读	58
三、列斐伏尔、梅洛·庞蒂与“巴黎手稿”：存在主义马克思 主义的解释	68
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巴黎手稿”	87

一、德拉·沃尔佩与“巴黎手稿”：以1957年的《卢梭和马克思》为例	89
二、阿尔都塞与“巴黎手稿”：以1965年的《保卫马克思》为例	92
三、科莱蒂与“巴黎手稿”：以1969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为例	103
第三节 20世纪60—70年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再探讨	112
一、弗洛姆与“巴黎手稿”：以1961年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为例	114
二、卢卡奇后期与“巴黎手稿”：以《青年马克思》（1954年）、“1967年序”与《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年）为例	118
三、马尔库塞后期与“巴黎手稿”：以1972年的《自然与革命》为例	128
第四章 “理性之伤”的辩证法救治：形而上学救赎及其可能性	133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与辩证法观	136
一、20世纪30—40年代：启蒙理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提出	138
二、20世纪50—70年代：将辩证法引入理性原则的一种新的辩证理性观的持续尝试	173
三、交往理性的提出：哈贝马斯论理性与辩证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	193
第二节 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与辩证法观	212
一、卢卡奇论理性与辩证法	212
二、梅洛·庞蒂论理性与辩证法	217
三、萨特论理性与辩证法	223
四、马尔库塞、卢卡奇等与萨特的论争：理性与辩证法	230
第三节 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与辩证法观	237
一、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论理性与辩证法	237

二、阿尔都塞论理性与辩证法	254
第五章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与经济议题	262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262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	265
第三节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与经济研究	270
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研究	271
二、社会过渡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	337
第四节 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研究	360
一、柯亨：奠定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362
二、布伦纳之争：“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369
第五节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研究	383
一、定义重释：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384
二、功能重建：文化研究与政治实践	388
三、范式重构：唯物辩证法与总体辩证法	393
第六章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权力论与主体论	398
第一节 福柯对现代性的反思：“话语—权力”及其 “身体—主体”论	399
一、以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而呈现的“话语—权力”论	400
二、权力与主体的生产：“身体—主体”论	408
三、对福柯的总体评价：一种“权力唯物主义”？	415
第二节 福柯的影响：从德里达到德勒兹	417
一、德里达：延异—书写论	417
二、鲍德里亚：打碎福柯话语—权力之镜的“拟像”原则	423
三、德勒兹：基于事件—权力论和“无器官身体”—主体论 的欲望哲学	432
参考文献	445

第一章 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

20 世纪上半叶（20 世纪 20 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此间，分别以卢卡奇（匈牙利）、柯尔施（德国）和葛兰西（意大利）等人为代表的西欧学者以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 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年）和《狱中札记》（1927—1937）等为标志，向第二、三国际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直面与回答，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直接理论动因。本章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归纳为：其一，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尝试；其二，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的努力；以及，其三，葛兰西对“实践哲学”之“绝对的历史主义”属性的强调。实际上，这三种回答皆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原则和主体—现实性原则（后者的载体是文化—意识形态）。这样的回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偏第二、三国际有机机械唯物主义之嫌的经济马克思主义（虽然后者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宿命，但却在借道黑格尔式的人本主义之路上冒着回归到另外一种宿命论（唯意志论）的危险。

第一节 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①中，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②可见，卢卡奇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或本质，理解为作为方法的辩证法（为此，他给自己这本书所命名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③）；而且，这种方法还不是自封为“正统”派的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卢卡奇称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④），甚至第三国际（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某些理论家^⑤所说的“辩证法”，而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实际指的是马克思本

① 该书主要由写于1919—1920年间的几篇论文（其中多篇论文此前已公开发表）所构成，1922年成书（作者当时写有“1922年序言”），1923年正式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版本；1967年作者又为其再版写了新的序言（“1967年序言”）。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语出该书中具有全书总纲意义的第一篇论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直到20世纪后半叶（1967年为该书再版写的新序言中，他也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在第一篇论文的引言中，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21页）。

③ 后有论者认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方法论”化，特别是把辩证法方法论化。这种从辩证法特别是作为一种方法的辩证法角度来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叙事方式，影响到了许多后来的学者，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中后期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诺曼·莱文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以及同为美国学者的伯特尔·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等著述中找到例证。

④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书和公开发表时期，也即20世纪20—30年代，这主要指的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而非主要指同为第二国际理论家阵营的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于后者，卢卡奇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⑤ 卢卡奇这里主要指的是布哈林等人。

人^①)的辩证法思想的正确“发展、扩大和深化”。那么,谁会是这个方向的正确的发展者呢?在稍后(约于1924年)成书的《列宁》一书中,卢卡奇做出了回答:“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极的理论,而只是在这种运用中并经过这种运用,作为理论才存在着。所以列宁的实践就使辩证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③。问题是,到底怎样一种辩证法,才可以算得上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辩证法”?卢卡奇为何会得出结论说只有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在卢卡奇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方法的辩证法,是总体性的,并因此是社会—历史性的和革命性的。

首先,辩证法应该是总体性的。正如事后他自己总结的,“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④。为此,卢卡奇甚至不惜“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⑤。也就是说,“总体”实际上具有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性意义。所以他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

① 虽然卢卡奇也指出,由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所解释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路径,是值得肯定的:“在这方面回到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解释传统中去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22年序”第43页)。

② [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3—104页。

③ [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4页。

④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5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5页。

本质。”^①因此，“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②。稍后（20世纪30年代成书），他在《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中的相关探索应该皆属此列。虽然后来卢卡奇因此一直被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本人却丝毫没有对此表示过后悔，甚至认为，“毋庸置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以后思想界的影响中，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起了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③。卢卡奇承认，在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让“黑格尔辩证法复活”的做法虽然在方法论上是“谬误”的，但却是“进步”的。这种进步当然是从反对第二、三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的。

其次，这种遵从总体性原则的辩证法，一定是社会—历史性的，并因此是革命的。卢卡奇声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④，其最根本的方面，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⑤，即坚持“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了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⑥。而我们知道，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行走的，不是别的，正是作为主体的人。他甚至因此不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说：“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⑦也正是通过对于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使得卢卡奇有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名，与此同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22年序”第42页。

③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5页。

④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⑤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0页。

⑥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0页。

⑦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0页。

时，也具有了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和制造两个马克思（特别是以青年马克思取代晚年马克思的指责）的嫌疑^①。而卢卡奇成就这一点主要归功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物化（异化）和阶级意识问题的探讨。如他自己后来的回顾，异化“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据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②。虽然，在哲学上对异化问题的揭示，很快使它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在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③，并由此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佩里·安德森语），但卢卡奇自己却认为自己所坚持的社会—历史的方法，使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对于异化的考察，“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④，因为，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从阶级的观点中，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中”产生出来的，“放弃这一点就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⑤。或许，他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列宁思想的伟大之处。

显然，我们可以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作为方法的辩证法的上述界定中，看到更多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影子（特别是其关于总体性辩证法本质和异化问题的分析），但如他自己所评判的，“对于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

① 他自己后来提供的辩解是：“我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他的世界观的完整画面之中，而在我这样做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愿意把它们仅仅看作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几十年后，这种关系发生了颠倒，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在那里，不管正确与否，我们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分割的整体”（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22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7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9页。

④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18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页。

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①。更何况，将辩证法赋予社会—历史的场域，进而以阶级意识命题赋予其革命内涵，至少让青年卢卡奇当时走出了一条反资本主义之路，虽然他身上还带有“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的“浪漫”^②。

总之，《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这一时期卢卡奇的其他论述的主题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正统，是辩证法，而且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种革命的辩证法，是总体化逻辑（历史的维度）上的社会辩证法，也即社会的人在既有历史条件下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行动和过程；因此它显然不是只遵循自然规律的单纯自然辩证法的逻辑，而是诉诸主体能动性积极发挥的主体（社会的维度）辩证法的逻辑。卢卡奇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论断，在理论上，如前所述，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即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的机械（经济）决定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严重误读，会直接延误甚至误导欧洲无产阶级的现实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就是通过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此，从哲学上来看，这个现实问题也即主客体关系问题，特别是主体能动性在当前工人阶级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即当前使得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可能的阶级意识问题——辩证法，于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条件）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个辩证法（卢卡奇理解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更来自马克思），既是总体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层面），又是革命的社会辩证法（实践层面）。因为，毕竟辩证法直接和当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即阶级意识的养成，有助于工人阶级正确理解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也即对社会现实的主客体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有利于推动革命行动的开展和成功。如卢卡奇所总结的，“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1967 年序”第 15—16 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1967 年序”第 3 页。

哲学”^①，因此，“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②。也就是说，晚年的卢卡奇依然继续着早期的探索，只不过更加致力于用社会—历史的维度（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替代总体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特别是其唯意志论的色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距离黑格尔更远，距离马克思更近。

第二节 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

为了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卢卡奇试图通过恢复辩证法来重建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他同时期的德国学者柯尔施则试图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而达到同样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1930年写的反批评材料，以及193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就是例证。

正如柯尔施在1930年的一个反批评材料中指出的，“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些命题是他在辩证法研究中发现的，并写进大约与我的书同时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当中”，“我基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虽然“我们之间依然存在”、“方法和内容上的特殊分歧”^③。这里所说的一致性，指的就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认识），柯尔施明确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④可以发现，无论是这一时期的卢卡奇，还是柯尔施，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涉及马克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4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967年序”第34页。

③ [德]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④ [德]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9页。